

中国杂文史

吴兴人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目 录

绪言	1
第一章 先秦的追索	10
第一节 先秦杂文——“最出色和最本质的杂文”	10
第二节 春秋战国杂文勃兴的社会历史缘由	14
第三节 汪洋辟阖的庄子杂文	22
第四节 犀利善辩的孟子杂文	36
第五节 浑厚绵密的荀子杂文	43
第六节 充满理趣的韩非子杂文	49
第七节 “百家之总汇，九流之钤键”的《吕氏春秋》	55
第八节 先秦余论	64
第二章 秦汉流变	74
第一节 秦世杂文一瞥	75
第二节 西汉鸿文的潮流	80
第三节 波涛汹涌的全盛时期	94
第四节 “太史公曰”的春秋笔法	112
第五节 东汉杂文之流变	126
第六节 汉赋中的杂文	144

第三章 魏晋风度	155
第一节 由博鸿沉实向清峻通脱演化	156
第二节 三国文坛露生机	162
第三节 晋代杂文传者鲜	187
第四节 南北朝的余绪	217
第四章 丰收的唐代	239
第一节 初唐风姿	242
第二节 危言铮铮	267
第三节 “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	283
第四节 肆意文章的柳宗元	304
第五节 古文运动之两极	318
第六节 晚唐翘楚	336
第五章 两宋繁星丽天	351
第一节 “渐复三代之故”的宋代杂文	351
第二节 新古文运动的缘起	354
第三节 “天下翕然师尊之”的欧阳修	359
第四节 三苏杂文	370
第五节 王安石、曾巩及其他	388
第六节 南宋的激扬文字	404
第七节 宋杂剧的并蒂莲——讽喻杂文	418
第六章 元明更化	433
第一节 元杂剧的繁茂与元杂文的衰微	433
第二节 遗民的哀音	435
第三节 明初观照	446

第四节	拟古与反拟古·····	463
第五节	晚明的长啸·····	481
第七章	没世之华章·····	499
第一节	一个颠倒的弧形·····	500
第二节	清初洪波·····	503
第三节	盛世桎梏·····	524
第四节	鸦片战争的一声炮响·····	544
第五节	激流过后,未失滔滔·····	558
第八章	20 世纪的现代杂文·····	583
第一节	亮丽的日出·····	586
第二节	30 年代的辉煌·····	607
第三节	鲁迅把现代杂文推向了最高峰·····	631
第四节	趋于全面发展的现代杂文·····	646
第五节	新时代是否还需要杂文·····	661
第六节	春风又绿杂文园·····	670
第七节	复苏与凋零·····	681
第八节	杂文的“泉眼”不会枯竭·····	706
第九节	新世纪的希望·····	722
参考书目	·····	726
后记	·····	731

绪 言

历史学家在社会里生活和工作,他们的职责一般是只说明这些社会的思想,而不是纠正这些思想。

〔英〕汤因比:《历史研究》

杂文,是中国文学史上历史最悠久的文学样式之一。它的最初问世,并不是以散文的附庸出现于读者的面前,而是与散文呈现“交叉状态”。它的存在先于戏剧、小说。先秦诸子的不少古文,可以看作是后世杂文之祖。杂文的含义和归体划类,虽然古今理解不一,但考察一下它的发端、流行、演变过程,对于研究中国杂文史来说,则是很重要的。

鲁迅指出过:“其实,杂文”也不是现在的新货色,是“古已有之”的。”^①最早为“杂文”列名者,是南朝刘宋时人范晔。他在《后汉书·文苑传》中列有“杂文”一项,列举杜笃“所著赋、诔、吊、书、赞、七言、女诫及杂文,凡十八篇”,苏顺“所著赋、论、诔、哀辞、杂文,凡十六篇”,赵壹“著赋、颂、箴、诔、书、论及杂文十六篇”等。但范晔对什么是杂文,未作解释。尔后,晋人挚虞的《文章流别集》(此书今佚)和南朝萧梁的刘勰把它列为文章之一体。刘勰在《文心雕龙》里专门写了《杂文第十四》一章。此章开篇就

① 《且介亭杂文·序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说：“智术之子，博雅之人，藻溢于辞，辞盈乎气。苑囿文情，故日新殊致。”^①指出杂文是一种具有特殊风格的文体。他还说：“自对问以后，东方朔效而广之，名为客难，托古慰志，疏而有辨。扬雄解嘲，杂以谐谑，回环自释，颇亦为工。班固宾戏，含懿采之华；崔駰达旨，吐典言之裁；张衡应间，密而兼雅；崔寔客讥，整而微质；蔡邕释诲，体奥而文炳；景纯客傲，情见而采蔚；虽迭相祖述，然属篇之高者也。至于陈思客问，辞高而理疏；庾散客咨，意荣而文悴，斯类甚众，无所取才矣。”^②这一段文字，对自两汉至魏晋的杂文，作了精确的概述和评价，可见自古以来的杂文，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十分丰富的，它包容吸收了各种文体之精华。

刘勰对杂文包容的范围作过一些划分，尤可值得注意。“详夫汉来杂文，名号多品，或典诰誓问，或览略篇章，或曲操弄引，或吟讽谣咏。总括其名，并归杂文之区，甄别其义，各入讨论之域”^③。范文澜对这几句话作过如下笺注：“凡此十六名，虽总称杂文，然典可入封禅篇，诰可入诏策篇，誓可入祝盟篇，问可入议对篇，曲操弄引吟讽谣咏可入乐府篇，章可入表章篇，所谓‘各入讨论之域’也。”可见，杂文可作广义和狭义的两种理解。广义的杂文应当是兼容各种体裁、各种形式，写法不拘一格。刘勰所指的览略篇章等十六种文体，“并归杂文之区”，则是广义的杂文，与范晔把杂文与赋、箴、诔、书、论并列的分类，显然是不同的。但是，刘勰提到的杂文，与我们今天所说的杂文，其实不大相干。而且他所说杂文是“文章之枝派，暇豫之末造”的观点，认为杂文乃非正宗，恐怕是代表了一般士大夫的传统看法，并不可取。

① 《文心雕龙注释》，第14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②③ 《文心雕龙注释》，第147—14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刘勰还把杂文比作光芒微弱的小星——参与昴：“枝辞攒映，嘈若参军。”这种评价也影响了后人。比如在宋代，有些士大夫就看不起杂文，认为它是小摆设，不登大雅之堂，但大学士欧阳修则不以为然。他在《苏氏文集序》这篇著名的文章里，在称颂苏舜钦倡导诗文革新功绩的同时，又肯定了他敢作杂文的勇气：“子美独与其兄才翁及穆参军伯长作为古歌诗杂文，时人颇共非笑之，而子美不顾也。”看来，轻视杂文之说，也是古已有之，但不足为奇。因为无论在两汉，还是在五代，均有一些文人写过一些小摆设的东西，纳入“文章之枝派”，自然未始不可，但它们不是今人所理解的杂文。

继范晔、刘勰之后，唐代欧阳询编的《艺文类聚》，五代王定保的《唐摭言》，宋代苏轼的《答谢民师书》和孙洙发现的《古文苑》，明代吴讷的《文章辨体》，徐师曾的《文体明辨》，以及清代李兆洛编的《骈体文钞》等等，都分类选入或谈论过杂文，但因古今名同，其实则有很大的差异。值得注意的是刘师培对《文心雕龙》中提到的杂文，具体分成三类：刘彦和作《文心雕龙》，叙杂文为一类。吾观杂文之体，约有三端：一曰答问，始于宋玉，盖纵横家之流亚也；厥后子云有《解嘲》之篇，孟坚有《宾戏》之答，而韩昌黎《进学解》，亦此体之正宗也。一曰七发，始于枚乘，盖楚词《九歌》、《九辩》之流亚也；厥后曹子建作《七启》，张景阳作《七命》，浩瀚纵横，体仿《七发》，盖劝百风一，与赋无殊，而盛陈服食游观，亦近《招魂》、《大招》之作，诚文体之别出者矣。一曰连珠，始于汉、魏，盖荀子演《成相》之流亚也，首用喻言，近于诗人之比兴，继陈往事，类于史传之赞辞，而俚语韵文，不沿奇语，亦俚体中之别成一派者也。”^①刘

^① 《论文杂记》第113页朴社单行本，1928年版。

师培对杂文所作的分类,可视为对广义的杂文的分类,他所分的“三端”,属颇有见地的一家之言。

狭义的杂文主要是指议论色彩比较浓厚的一种文章,即《汉书·艺文志》里所说的“杂说”一类文章。“议论而兼叙说者,谓之杂说。”具有“议论”和“叙述”两方面的内容,并用文学的笔调来表述,就是狭义的杂文。清人俞曲园在其《春在堂全集》中,有别题《春在堂杂文》者好几十卷。他在序文中说“体格卑下,殆不可以入集”的文章,统统叫做“杂文”。这种看法不能令人同意,至少不能叫做狭义的杂文。《文心雕龙》中指的狭义的杂文是对问、七、连珠三体。

狭义的杂文也不是完全无定格的文章。因此,“曲操弄引”,就不能称之为狭义的杂文。“曲”是乐曲,“操”是琴曲,“弄”是小曲,“引”是音调拉长的歌,将这四者列入“乐府”还说过得去,若和刘勰前面提到的《七发》等三篇杂文相比,那就不那么谐和了。“典”、“诰”之类,前者指法度,后者为上命,也难以列入狭义的杂文。宋初古文运动的先驱者柳开曾对古文作过一个解释:“子责我以好古文;子之言,何谓为古文?古文者,非在辞涩言苦,使人难读诵之,在于古其理,高其意,随言短长,应变作制,同古人之行事,是谓古文也。”^①柳开对古文的解释,几近于狭义的杂文。晚清的章太炎在《文学论略》中,把杂文分为“符命”、“论说”、“对策”、“杂记”、“述序”、“书札”,其中除“符命”外,他基本上把杂文看作是议论性的杂体文,更接近于人们对现代杂文的理解了。

近人刘半农对杂文作的解释则是:

“今称之为‘杂文’者,谓其杂而不专,无所不有也:有论记,

^① 《应责》,《宋金元文论选》第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有小说,有戏曲;有做的,有翻译的;有庄语,有谐语;有骂人语,有还骂语;甚至有牌示,有供状,称之为‘杂’,可谓名实相符。”^①此论虽不能算是对“杂文”所作的确切定义,但主张形式翻新、灵活多变,还是很对的。

从先秦到晚清,杂文这朵带刺的玫瑰曲曲折折地生长着,生命力是很顽强的,也是很充沛的。下面简要考察一下两千多年来杂文的流变。

春秋战国,辩子云涌,纵横参议,雄文迭出。一人之辩,胜于九鼎之重;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在诸子的论著中,约略可见古典杂文的踪迹。战国时期的杂文,主要有两种:一种用散体写的寓言式杂文,另一种答对论辩式的杂文,但均有“议论而兼叙述”的特点,与诸子的散文合流,呈交叉状态。孟子的《齐人》,可谓是先秦诸子古典杂文中最出色的篇章之一。宋玉的《对楚王问》,辞意宛转,刘勰称此文为对问式杂文的创始者。荀子的《劝学》、韩非的《说难》,都有杂文的理趣。特别是庄子的杂文,波澜壮阔,妙语天成,鲁迅说他“凌轹诸子”。秦汉以来,李斯的《谏逐客书》、贾谊的《陈政事疏》、晁错的《论贵粟疏》,指陈利害,议论透辟,切中时弊,锋芒锐利,开一代文风之先。司马相如和司马迁,并称“两秀”。司马迁的那篇赫赫有名的《报任安书》,虽是一篇书信体文章,却是包括在“名号多品”的杂文之内的。《史记》中的“太史公曰”,或褒或贬,或寓褒于贬,言简意赅,倾向分明,多有杂文佳作。杂文到了魏晋,起先势头还很不错。章太炎评论道:“大体皆埤于汉,独持论仿佛晚周。气体虽异,要其守己有度,伐人有序,和理在中,孚尹旁达,可以为百世师矣。”^②后

① 《刘半农文选》,第29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② 《国故论衡·论式》《章太炎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来虽有崇尚虚无、专谈玄理的“清言”，但寿命并不长，和晋代一同消逝了。南北朝的谐隐之文，会议适时，颇益讽戒，亦可一观。

唐代杂家辈出。初唐四杰，出手不凡，骨气翩翩，都有杰作传世。复古开新，陈子昂功不可没。韩愈、柳宗元提倡古文运动；“杂说”一类文章增多。韩愈的“伯乐相马”等篇，题目便标明为《杂说》；柳宗元的《黔之驴》，故事引人入胜，议论发人深省；刘禹锡的《陋室铭》，也是文短情长之作。韩、柳之后，李翱、皇甫湜、杜牧、孙樵，均有力作面世。唐末诗风衰颓，小品文又放了光彩。《皮子文薮》中的杂文，被鲁迅称之为“并没有忘记天下，正是一塌糊涂的泥塘的光彩和锋芒”，而罗隐的《谗书》，可谓名副其实，几乎全部都是抗争和愤激之谈。大器晚成，堪为晚唐三绝。

到了宋代，杂文的名声也不坏。“唐宋八大家”，宋代就占了六家。在三苏的策论中，不少篇章论辩精当，闻者叹服。苏洵的《名二子说》，从对他的两个儿子的命名论及其未来前程，均有幸而言中。有些大作家也时时挥笔作文，其地位并不在诗赋之下。苏东坡的《赤壁赋》、范仲淹的《岳阳楼记》，都是传颂千古的杂文名作。王安石是一政治家，但也好写杂文，而且一次就拿出十篇。他在《上人书》里写道：“书杂文十篇献左右，愿赐之教，使之是非有定焉。”南宋杂文讽诵文采集中喷涌，与宋杂剧的繁茂有着某种亲缘关系。柳宗元的《三戒》，在南宋罗大经、姚镗、陈师道等人的作品中，获得了生命嗣承的载体。

金、元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士气消沉，文学本无特色，虽有元曲拍唱，但杂文能与唐宋名家抗衡者，几乎绝无仅有。值得庆幸的是，在寂静肃杀之中，仍有邓牧的《伯牙琴》、元好问的《市隐斋记》、陶宗仪的《寒号虫》、戴表元的《猫议》等几息深沉的愤慨之声。

明初小品重新崛起。刘基、宋濂文尚豪纵,神绉四出。在当时又有杂文集出版,名曰“杂著”。《郁离子》以寓言立论,讥刺时政,可谓明代杂文的最佳之作。明代中叶,随着八股文的横流,文字狱屡兴,杂文并不景气,直到明末又呈现了某种生机。李贽的《焚书》,焚后犹存,激昂慷慨,充满了对末世的抗争。《赞刘谐》和《题孔子像于芝佛院》,是两篇非孔的名文。

清初一部分知识分子不满清廷的统治,曾用杂文抒发他们的不平,结果很不美妙,写过“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的诗句的文人也掉了脑袋,于是小品文又成了“小摆设”。此后,杂文消沉了两百多年。直到鸦片战争前后,龚自珍慷慨论天下事,开晚清讥切时政的风气之先;章太炎之文超越六朝,取法东汉,在古朴中寓生气,以之谈玄说理,研讨民族民主革命,言论至为激亢;魏源、严复、梁启超更以其恣肆的思想,发为磅礴一世的文章。至此,杂文才得以重振雄风。在此同时,薛福成、李慈铭、谭嗣同、康有为、王韬、林纾、马建忠、唐才常、郑观应等人的作品,虽未能与龚、严、梁、章并驾齐驱,但他们写的不少文章,质量也属一流。激流过后,未失滔滔。晚清时论是古代杂文过渡到现代杂文的中介,是古文向白话文演化的开端。

由此可见,杂文自古以来,早就登堂入室,进入了文学的殿堂。它与古代散文大抵同时产生,时而交叉,时而分流,有分有合,自成一体。诚如鲁迅所指出的:“杂文这东西,我却恐怕要侵入高尚的文学楼台去的。”^①当代杂文家黄裳也提出:“作为一种文学样式,杂文的地位一点也不低于小说、诗歌……这是鲁迅先生曾经表示过的意见,人们应该还没有忘记。”^②现代杂文这种

① 《南腔北调集》,第16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② 《杂文的历史长河》《羊城晚报》1983年7月4日。

文体,是在清末梁启超所首创的“报章体”的基础上,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孕育而发展起来的,到了20世纪30年代,经鲁迅的努力,创造了战斗的“阜利通”(即小品文),使杂文有了更加旺盛的生命力。他所创作的杂文,几乎成了后来者难以逾越的高峰。

从上述两千多年杂文发展起伏的简要观照中,可以约略窥探到一条较为明晰的轨迹:杂文的兴衰与时代的起伏有着密切联系,两者大抵同步。在世事多变、朝代更迭之际,或政治修明、广开言路之时,则造就了杂文的繁荣;反之,专制过甚,思想控制严密,万马俱暗,杂文也就凋零了。

在我看来,杂文是和小说、戏剧、诗歌、散文一起登入文学大雅之堂的一种文学样式。它是一种直接而迅速地反映社会事变的文艺性政论,是文学、艺术、哲理、知识的结晶,可以说是一种边缘文学,以短小、锋利、隽永为特点。唐弢指出:“我以为小品文的所以杂,所以无所不谈,正足以表示它反映整个社会,具备了文艺作品的主要条件。它并不像其他各科那样,只限于一种专门知识。它是内容技巧并重的。”^①杂之义广,形式多样,表达上的外向和题旨上的内涵融为一体。杂文的上乘之作,应该是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的结合,诗与政论的结合。杂文可以是一种政论,它的本质是说理的,但它不是时代精神的标签,不是政策的图解,它阐述政治、思想、观点的形式,应有艺术的华彩。旁征博引、说古谈今、幽默讽刺、借题发挥、由小见大、浮想联翩,则是须臾不可离开的。杂而有文,正是杂文区别于一般新闻短评、政论之所在。正因为杂文是一种文学样式,它的开头、结尾、结构、语言以及材料之运用、议论的穿插,都要作匠心独具的安排。杂文既要给读者以有益的启迪,也要使读者获得精神的愉悦。

① 《小品文拉杂谈》《小品文和漫画》第50页,生活书店,1935年版。

干巴巴、死板板、硬邦邦,是杂文的大忌。瞿秋白说过杂文是文艺性的社会论文。这一著名的提法,是对上述杂文的要义作了简要而确切的概括。真正进入了杂文世界,那么,就会感受到这个世界决不缺少文学的理趣、艺术的魅力,更不待说其中的真知灼见和翔实的史识了。

如果读者大致同意上述对杂文所作的解释,那么,我们就对杂文的漫长的流程和变化,作一些微观的考察吧。

第一章 先秦的追索

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一批帛书,其中有《老子》、《战国纵横家书》、《易经》及一些失传了一两千年的古籍。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发现。它再次证明了长江流域在两千多年前已有了灿烂的文化。当整个欧洲还在黑暗中摸索时,世界的东方却四处闪亮着文明的火光。中国是一个有杂文传统的国家。古典杂文这种文艺形态,在早期的东方文明中,已初露锋芒。

第一节 先秦杂文——“最出色和最本质的杂文”

先秦是一个比较广泛的历史概念,它包括了上古、夏、商、周、春秋、战国这些年代。中国古代散文的产生,最初是从巫卜记事开始的,后来便产生了《易》卦爻辞一类文字。卜辞的作者是身兼神职和史职的巫觋。巫觋担任着沟通着人神意志的使命,女的叫“巫”,男的叫“觋”。韦昭注曰:“觋,见鬼者也。《周礼》:男亦曰巫。”我们可不要小视这些人。在殷商时代,这些代神立言的术士、巫师,是最高水平的知识分子,是精神文化的权威。鲁迅认为巫师是最早的文章作者,他说:“连属文字,亦谓之文。而其兴盛,盖亦由巫史乎。巫以记神事,更进,则史以记人

事也,然尚以上告于天;翻今之《易》与《书》,间能得其仿佛。至于上古实状,则荒漠不可考,君长之名,且难审知。”^①巫师们最初写的文章,不是给人间的读者读的,而是为了“上告于天”的,结果却给后人留下了以文字表达思想的方式——文章。

卜辞是现今所存的中国最早的文章。巫覡们在手舞足蹈、献媚于鬼神之余,又在龟甲和牛骨上开始了文字和散文的创作活动,写下了三言两语式的、最简单的、最朴素的文章,或纪事,或占卜,或说教。因为这些文章镂于甲骨,地位狭小,作字困难,所以大多十分简单,既不成篇,也不成章。如:“帝其降董(饗)。”“帝令雨弗其足年?”今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②文句虽然简短,但语法上已有初步的规格,可以大体看出一点文章的雏形。

尔后便出现了《商书》中的《盘庚》。《史记·殷本纪》云:“帝盘庚之时,殷已都河北,盘庚渡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乃五迁,无定处,殷民咨胥皆怨,不欲徙。盘庚乃告谕诸大臣曰:‘昔高后成汤,与尔之先祖,俱定天下,法则可修,舍而弗勉,何以成德?’乃遂涉河南治亳,行汤之政,然后百姓由宁。殷道复兴,诸侯来朝,以其遵成汤之德也。帝盘庚崩,弟小辛立,是为帝小辛。帝小辛立,殷复衰,百姓思盘庚,乃作盘庚三篇。《盘庚》篇极为难读,韩昌黎《进学解》曰:‘周浩殷盘,诰属声牙。’难懂的原因是多用方言及通假字之故。文章纵然难读,但比卜辞大大前进了一步,其中也有一些复杂的思想和很好的譬喻:‘若观火’、‘若纲在网’、‘若农服田’、‘若火之燎于原’、‘若射之有志’。它对于后世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的散文,自然不无影响。

① 《汉文学史纲要》《鲁迅全集》第8卷,第25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② 郭沫若《卜辞通纂》第364、363、375页,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从殷文过渡到先秦诸子杂文,还有一座桥梁。这就是《易传》的哲理文章。《易传》为《彖辞》上下、《象辞》上下、《系辞》上下、《文言》、《序卦》、《说卦》、《杂卦》,共有十篇,称为十翼。《易传》中最富思想、辞采的是《系辞》。请读其中的一节:

子曰: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以乎?《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是以君子将有为也,将有行也,问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响,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与于此?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变,其孰能与于此?《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

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圣人之道四焉。此之谓也。

这段文章虽然只有三百多字,却组织得极为严密,对于“圣人之道”,论证得有条不紊,头尾也能做到前后呼应,可以独立地当作一篇文章来读。借助于《易传》这座桥梁,诸子们跨越了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阶段,吸收了说辩的滋养,一个空前热闹的杂文艺术世界将要出现了。

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涌出。僵化的古文,已难以适应政治、思想领域里的激烈交锋,诸子百家各自授徒讲学、著书立说,形成了各种不同的学派。他们为要有效地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在文字的表达形式方面,带来了一个巨大的突破。诸子散文的勃兴,可以说是势之所然。